

·书札整理研究·

许乃普、钱仪吉、许瀚等致杨以增函札辑释

周广骞 丁延峰 骆伟

内容摘要:山东聊城海源阁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,其创建者杨以增从政数十载,宦迹逾十省,曾任陕西巡抚及江南河道总督长达九年。杨氏重情义,忠职守,广交游,精藏弆,与友朋信札往还颇多。卒后,其子绍和辑为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二十册,珍藏于海源阁。后因捻军、土匪多次焚掠,散失颇多,今存两册,现藏山东省图书馆。信札作者如林则徐、萨迎阿、陈官俊、吴式芬等,皆为道咸之际重要的官员、学者,与杨以增过从甚密。信札或谈学论政,或叙及家事,或言及交往,或馈遗藏书,是研究杨以增及其友朋的第一手材料,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杨以增 友朋 尺牍 辑释

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,以庋藏宏富、版本精善著称于世,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称“南瞿北杨”。海源阁创建人杨以增(1787—1855)字益之,又字至堂,晚号东樵。清道光二年(1822)进士,由县令洊升道员,历任陕西巡抚、江南河道总督,并曾暂署陕甘总督、漕运总督。其为官三十馀年,交游广泛,书信往来颇多。这些信件屡有散佚,其中咸丰十一年(1861)捻军洗劫杨氏另一藏书之处——陶南山馆,所藏大量善本、文物及尺牍惨遭焚毁,而尺牍亦是损失最多的一次。其子杨绍和于同治十一年(1872)将陶南残余辑为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,精裱锦装为二十册,每册各为一卷。清光绪二十年(1894),杨以增之孙杨保彝请广西临桂龙继栋题跋并附于其后。杨绍和《序》称:“先君端勤公平生笃交际,每获师友信札,辄什袭箧中,或畀绍和收弆。阅时既久,所积遂夥。顾官辄十有数省,舟车所至,不无零失。咸丰辛酉(十一年,1861)捻寇之乱,其存诸陶南别墅者又多墮红羊。绍和理而董之,得千馀纸,付之装池,都为廿册。”^①1930年前后,海源阁三遭兵燹之祸,信札仅剩两册。1957年,海源阁第四代传人杨承训将其捐献给山东省文化部门,今藏山

^①杨绍和: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卷首,山东省图书馆藏。

东省图书馆。

骆伟先生曾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二十馀年，亲手整理过海源阁藏书。并在此基础上，将这批尺牍中林则徐致杨以增的18通加以辑注整理，发表于《文献》1981年第1、2期；李士钊亦曾按原札格式整理17通后，发表于1983年第1期《聊城师范学院学报》。2007年，骆先生又将杨以增致许瀚的8通信札进行辑注整理，发表于台湾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》2007年第15期。2012年，骆先生又在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中选取萨迎阿、翁同书、陈官俊、吴式芬等四人信札13通，标点注释后，发表于《天一阁文丛》2012年第10期。目前，山东省图书馆所藏《海源阁珍存尺牍》中，尚有部分未进行整理。由于多次遭劫，札页多有残缺，笔者即从中选取相对较为完整的14通，加以整理考释，以飨读者。

吴荣光函（二通）

（前缺）所刻《苏诗》，生在杭州时曾得一部，存次儿^①书箱，现在杭州。如粤中觅不到□，容即将杭州一分逐便觅寄也。拙诗未校，仅抄得四帙，尚有二帙屡催未得。因尊纪来粤，始行付抄。其人书写甚缓，而尊纪又不便久稽，其未抄二帙及文四帙，容觅便再寄。

首县一席，可免甚好。年兄腾达有日，不在此区区也。惟嘱勉为循吏廉吏，以副远怀。生趋庭之顷，家严能独立周时不倦，此足寿徵。因笃促依限进京，五月中旬必成行矣。此后如有书，可径寄都中相好转交，以免往返参差也。

承录省中近事既详且细，□谢！太翁^②系生同年，阅属书条事始悉。一向短礼，歉歉！未知太翁在任，抑或出任何省？便中示及。外许学台^③信一函，内有要件，祈加封妥投，或专差更好。张、何二君各一函，系去年写于□，寄粤□信于生函内□出者。生不复加封，祈夹单递省为要。□事颇忙，归籍后未开画具，而行期又近，俟不拘何地，抽闲作一二小书画奉致，惟不能定以时日耳。

①即吴荣光次子尚志，此时正读书于杭州吴荣光甥家。

②即杨以增之父杨兆煜。兆煜（1768—1838），字炳南，又字熙崖，自号实夫。嘉庆三年（1798）举于乡，十三年（1808）会试大挑二等，十八年（1813）选授莱州府即墨县教谕。二十三年（1818）辞官归里养亲，时仍在山东聊城家居。参见梅曾亮：《浩封中宪大夫安襄郎荆道即墨县教谕杨府君墓志铭》，《柏枧山房文集》卷十三，咸丰六年（1856）杨绍谷、杨绍和海源阁刻本。

③即许乃普。乃普（1787—1866），字季鸿，浙江钱塘人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实录馆纂修提调官。历任兵部尚书、光禄寺卿、吏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衔，卒谥文恪。许乃普与杨以增道光五年（1825）在贵州“一见即深相契，投份遂密”，此后杨绍和又从之游，“卅年交谊，兼以通家”，情谊深厚异常。杨以增去世后，许乃普为作《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墓志铭》。

荣光^①又白。四月初二日。

按，吴荣光手订《荷屋府君年谱》云：（道光五年十月）“接家信，闻资政公偶病腹泻，请於巡抚，照京官告假省亲例请开缺。”^②同年十二月回至粤东老家。其父欢慰异常，腹泻旋瘳，此可与吴荣光信中“家严能独立周时不倦，此足寿徵”相印证。同《谱》又云：（六年）“六月假满旋都”，^③亦与此信中“因笃促依限进京，五月中旬必成行矣”所言相同。可知吴荣光省亲粤东始自道光五年（1825）十二月，迄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五月，前后共半年时间。在此期间，杨以增当有索取吴荣光诗文集之请，并派人专程赴粤，故此信中有“尊纪来粤”之表述。据此可判定此信当作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四月，吴荣光时尚在粤东省亲。再按，许乃普于道光五年（1825）出任贵州学政，时仍在贵州，故吴荣光信中称许乃普为学台，亦可为此信作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之旁证。

杨、吴二人相识较早。杨以增道光二年（1822）考中进士后分发贵州，任长寨同知，四年（1824）任荔波知县。吴荣光则于道光三年（1823）十一月奉旨调补贵州布政使，四年（1824）四月到任，七月护理贵州巡抚，不久即奉旨于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折保奏杨以增“才识练达，任事实心……甫任荔波，循声已著，为明干有为之员”^④。五年（1825）吴荣光离黔赴粤，二人同宦贵州一年有馀，相交已深，此后虽见面不多，但仍不时闻问，杨以增且将贵州近况详悉告知。吴荣光年辈高于以增，且曾为其上司，此信中称“年兄腾达有日，不在此区区也”，对杨以增颇为期许赏识。其“惟嘱勉为循吏廉吏，以副远怀”等语，亦颇有长辈谆谆教诲之意。吴荣光长于书画，在此信中称“俟不拘何地，抽闲作一二小书画奉致”，亦足见二人关系之亲密。

手翰至，欣望吾兄大人近履亨嘉，新猷懋远，无任倾慕。少穆^⑤制府莅楚，伫见局面转换，作好友者咸知奋勉。尊名久已闻知，绪论所及，不胜钦仰。弟碌碌如前，拟秋冬之交再定行止。专此奉复，即贺升禧，谦版敬璧。

愚弟吴荣光顿首。二月二日。

捕盗出力，未知可注劳绩否？弟又上。

①吴荣光（1773–1843），字殿垣，一字伯荣，号荷屋，晚号石云山人，广东南海人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进士，由编修擢御史。道光中任湖南巡抚，后坐事谪福建布政使。长于鉴藏，工书善画，精于诗词。

②吴荣光：《荷屋府君年谱》，北京图书馆编：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，第338页。

③吴荣光：《荷屋府君年谱》，北京图书馆编：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第340页。

④吴荣光：《遵旨保奏属员折》，录副奏折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⑤即林则徐。则徐（1785–1850），福建侯官人，字元抚，又字少穆，晚号俟村老人、俟村退叟，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，曾任湖广总督、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，两次受命钦差大臣，主张严禁鸦片。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四月，杨以增与林则徐一见如故，初定交谊。时杨以增次子绍和年七岁，以赋诗受知于则徐，遂执贽为弟子。

按，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正月升任湖广总督，同年三月上任。吴荣光函称“少穆制府莅楚，伫见局面转换，作好友者咸知奋勉”，对林则徐任职湖广颇多期许，据此亦可判断此信当作于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二月二日。

杨以增自道光五年（1825）与吴荣光分别后，先后任贵筑知县、松桃直隶厅同知、兴义府知府、贵阳府知府，十四年（1834）升任广西左江道，旋任湖北安襄郧荆道。吴荣光省亲后，于六年（1826）任福建布政使，十一年（1831）任湖南布政使，旋升湖南巡抚。十六年（1836）因上年年终密考学政自占地步，而降为四品京堂，赴京候补，同年六月抵京。直至十七年（1837）三月补授福建布政使才离开京师。由此可知，吴荣光写此信时正处于降职在京、前途未明的人生低谷，故有“弟碌碌如前，拟秋冬之交再定行止”之语。

杨以增在安襄郧荆道任上勤于捕盗，治绩突出。许乃普《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墓志铭》云：“所辖境与秦楚豫壤相错。俗悍率为盗，且出没不易获。公时与提军罗公思举会哨于郧，宵小戢迹。罗久历行阵，战功高，遇贵戚重臣不为礼，独敬礼公。”^①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四月，吴荣光时任湖南巡抚，曾与新任湖南提督罗思举剿灭江华“猺匪”赵金龙。罗思举此时调任湖北提督，与杨共同捕盗。吴荣光在此信附及之语称其“捕盗出力，未知可注劳绩否”，足见对其关心之情。

许乃普函（四通）

至堂制军老棣台年大人阁下：

前泐芜缄，并属查访赴闽之便奉致之语，想蒙聆悉。近年来，度支稍绌，然圣人在上，求治綦殷，自足感召和甘，得数载丰收，元气可复。无拟司农仰屋，有岌岌无以卒岁之忧，不为当事者作设身处地之想，力求撙节，罔计后患。柏台诸公尚墨守花天酒地之说，以乾嘉时河员习气例之今日。惟赖当宁聪明天亶，自有权衡，不动声色，而太阿在握。如阁下之荩忱清节，都中本无闲言。实在支绌情形，似可直陈于圣主之前。否则工烦费巨，无米之炊，洪湖河坝岁久失修，若听其自然，明春何以宣泄？六、八、十等月三次掣塌之石工，作何修补？岂能限于常年三百万之数乎？在局外者代为设想，亦不知何以善其后。惟有焚香告天，积诚悟主，以理揆之，自应若是，未识高见以为然否？

京城自入冬后，天气甚正，且屡得瑞雪，从此当兆咸丰之庆。贱体如常，耳目腰脚尚可当差，足纾垂廑。

耑此泐请荩安。临池翘企，恕不庄謹。嘉平十二日。

按，道光三十年（1830）正月，道光帝旻宁驾崩，其子奕詝即位，循例当于次年改元。嘉平月为十二月，距新年改元不远。此年冬京城屡获瑞雪，岁时调

^①许乃普：《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墓志铭》，《聊城县志·耆献文徵》卷又下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文行出版社。

和,故许乃普信中称“从此当兆咸丰之庆”,其中颇有万象更新之意。据上拟将写信时间定为道光三十年(1850)十二月十二日。

清道光朝每年东、南两河工费高达七八百万两,占政府开支的五分之一,已经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。道光帝对河工浮冒深恶痛绝,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十一月十五日上谕称“河工浮冒,人所共知”^①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十一月十九日,两江总督李星沅上《附奏请裁河工浮费片》称:“以臣约略计之,南河四属二十三厅,每年寻常例用当以三百万两为率。”^②道光帝对李星沅所奏颇为认可,遂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)三月初二日准户部咨称:前据李星沅奏每年寻常例用当以三百万两为率,自系体察情形,确有把握。但与李星沅所奏之语相比,去掉“约略计之”四字,且又要求除每年实用三百万两之外如有馀剩,即于河款内扣除。这样一来,便将李星沅的约略之词变为明确要求。南河河工款项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,道光二十六(1846)至二十八年(1848)分别用银423.6万两、406.4万两和346.4万两,均远远超出三百万两之额度。杨以增自道光二十八年(1848)九月四日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,于同年十二月初六日正式上任后,即面临大幅削减南河河工经费的任务,压力巨大。许乃普在朝廷任职多年,他认为,咸丰帝即位之初“求治綦殷”,急于整顿南河,柏台诸公(负监察责任之御史)还存有南河河员奢侈贪腐、徒靡经费的旧观念,而南河河坝失修、工繁费绌,兴修又刻不容缓。在这种形势下,杨以增“荩忱清节”,勤勉为公,完全可以据实直陈南河经费支绌情形,以便得到咸丰帝的认可,同时亦能为办理南河工程、保障漕运畅通争取主动。

新正一械肃谢,想已早达典籤,辰惟承恩赐福,与日俱长,勋绩增崇,事机稳顺,固可于荩忱清节卜之也。惟瞬届南漕北上,度支又拘于新□。种种为难之处,公勤筹划,心力交劬,当希随时摄卫。恭值圣主当阳如神坐照,薄海内外无不可上达之隐。一德一心定孚天鉴,是又可券祝者耳。兹乘来工学习之颜员外锡惠^③带上蔡忠惠《端明集》两函、曾子固《南丰类稿》两函,祈饬纪检存。此二书皆大兴朱筠河^④先生旧藏本,较《四库》所收

①《清宣宗实录》卷四六一,《清实录》第39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822页。

②李星沅:《李文恭公奏议》卷十九,同治五年(1866)芋香山馆刊本。

③颜锡惠,山东曲阜人。道光十二年(1832)进士,初授大理寺推官,调钱法厂,后升户部河南司员外郎,终淮安府知府。

④即朱筠。朱筠(1729—1781)字美叔,又字竹君,号笥河,顺天大兴人。乾隆十九年(1754)进士,授编修,累迁日讲起居注官、翰林院侍读学士,督安徽学政,后以过降为编修。倡开《四库全书》馆,积极奖掖后学,戴震、章学诚等均得其助。参见孙星衍:《笥河先生行状》,《笥河文集》卷首,嘉庆二十年(1815)椒华吟舫刊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4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10页。

本卷数增多，见少河山人^①跋尾，谨归之邺架。公余检阅，或可少舒心目，亦野人献曝之意也。

普耳目腰脚尚可当差，且文字结习，自幼无一日不亲笔砚。习与性成，安之若素。天恩高厚，不敢更生他想矣。肃颂台安暨阁中膝下万福。

乃普顿首上至堂老様台年大人阁下。二月廿四日。

按，因河防关系重大，清代自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起，在六部、都察院等衙门拣选正途出身、清慎勤敏之京员，发往东、南两河学习。颜锡惠时任户部河南司员外郎，奉咸丰元年（1851）二月初一日上谕发往南河，交杨以增差遣委用。又据杨以增咸丰三年（1853）三月初二日《京员学习期满请留工补用折》称，颜锡惠于咸丰元年（1851）四月十七日到工。据此即可确定此信作于咸丰元年（1851）二月廿四日。

杨以增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十二月正式上任后，即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、三十年（1850）连遇河湖暴涨。他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七月十六日上《重运漕船渡黄完竣折》云：“今岁自春徂夏，江浙雨多水大，以致江河湖海同时并涨，积久不消，为历年所未有。”^②后又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七月初一日上《伏汛安澜折》，上报当年六月水情称：“计旬日之间，上游来源共长至三丈八尺，实为罕有之事，以致江境前涨甫消尺许，复又大长……浩瀚异常，上自丰萧，下至安阜，普律出槽漫滩，纷纷报险。”^③清朝历代皇帝均对漕运非常关注，道光帝更是强调治河即以通漕，要求河督漕船每进一帮，即具奏一次，且明确规定，每年四月十日重船即须抵坝渡河，封冻之前必须全数归南，这些都给杨以增增加了极大的压力。许乃普在朝廷担任高官多年，深悉南河事务难在务保漕运，而又经费不足。因此在此信中称“种种为难之处，公勤筹划，心力交効，当希随时摄卫”，对杨以增非常关心。

许乃普深知杨以增有爱书之癖，尤重旧刻旧藏。因颜锡惠将赴南河，故托他代送书籍。其所赠之书，杨以增颇为喜爱，并珍藏于海源阁中。杨绍和《楹书隅录》（初编）卷五著录“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十六册二函”，并录朱锡庚（即许乃普此信中所称之“少河山人”）跋语及朱筠、朱锡庚父子藏印^④。

①即朱锡庚，锡更（1762-？），字少白，号少河山人，顺天大兴人，朱筠次子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举人，官山西候补直隶州知州，署潞安府知府。著有《未之思轩杂著》、《未之思轩诗草拾遗》、《璞存山房初稿》等。参见江藩：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《朱筠传》附录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68页。

②杨绍和：《先都御史公奏疏》卷九，抄本，山东省图书馆藏。

③杨绍和：《先都御史公奏疏》卷十三，抄本，山东省图书馆藏。

④杨绍和：《楹书隅录》（初编）卷五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杨氏海源阁刻本，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第3册，中华书局，1887年，第536页。下引“宋本元丰类稿”条，见同书第538页。杨绍和据朱锡庚所述将《元丰类稿》定为宋刻，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考订为大德八年（1304）东平丁思敬刻本，前脱丁序及元大德八年（1304）程文海序。

同卷著录“宋本元丰类稿五十卷续附一卷二十四册二函”，并录朱锡庚卷首识语及朱筠、朱锡庚等人藏印。据此，则二书均经朱筠、朱锡庚藏，分别有朱锡庚卷末跋语及卷首识语，许乃普此信中均称跋尾，当因未能细查而致误。

顷于邸抄中知查廉使奉命来浦，襄办丰工，未识伊何时可到？冬令在迩，水落归槽，人力似易施展，必无误空运。是否可从容办理，以待来春筹划，必有定见，尚祈风便示及，以纾驰仰。

谨又启。

再，新科举人覆试例于二月望日在贡院开考，其未到者准于二月廿五日在殿廷补试。贤郎^①务于新正抵都，一切较为从容。能在内城作寓，庶可习静，盼切。寒家今科中两胞弟，一民卷（未完）

按，杨绍和中举在咸丰二年（1852）秋，许乃普信中称“冬令在迩”，又建议杨以增让杨绍和于翌年（1853）新正到京，则此信当作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秋冬之交。惟此信未完，故不能确定具体写作月日。

咸丰元年（1851）八月二十四日，南河丰北三堡堤工漫水决口，杨以增因未能先事预防，于同年闰八月十一日被摘去顶戴，交部议处，遭遇到仕宦生涯中第一次重大挫折。因夏秋黄河水势浩大，经筹措款项、堆贮物料后，延至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兴工堵筑丰北黄河决口。但此次施工并不顺利，未能如期堵合，只得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三月上折要求延缓堵口，并自请严加治罪。咸丰帝得报非常不满，于二年（1852）四月初六日将杨以增革职留任。许乃普对杨以增堵筑决口非常关注，在此信中建议杨以增当在冬令到来之际，趁水落归槽、人力易施之时，加紧办理堵口工程。杨以增对第二次堵口不敢有丝毫马虎，于二年（1852）十月二十五日诹吉兴工。经过艰苦努力，终于在三年（1853）正月二十六日成功堵合决口，全黄归正。咸丰帝得报非常欣喜，于二月初二日颁下上谕，称“杨以增经理得宜，不负委任，著加恩开复革职留任处分，给还顶戴，赏加三级”^②。此时杨绍和当已遵许乃普之嘱，赴京准备应试，并未在南河襄助。

至堂老弟台年大人阁下：

老懒久未奉书，想劳重盼。新秋暑退，惟钧候胜常为颂。

兰阳下北斤告警，恐直隶大名所属及山东曹、单一带皆不免有被淹处所。堵筑力有不及，抚恤政所必先，否则弊鸿满目，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本年海运到津甚速，而洋盗已渐萌动。倘运河有阻，则海运亦不尽可恃。嵩

①即杨以增次子绍和。杨绍和（1830—1875），字彦合，号勰卿，山东聊城人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历任詹事府右春坊、右赞善、右中允，擢翰林院侍读、侍讲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升通议大夫，同年卒。著名藏书家、目录学家，海源阁第二代主人。参见张英麟：《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公墓志铭》，《聊城县志·耆献文徵》卷又下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文行出版社。

②《清文宗实录》卷八四，《清实录》第41册，第70页。

目时艰，真令人无从筹策也。七舍弟赴湘省办理团防事宜，与各当事颇称相得，尚易措手。惟饷需不给，□特劝捐抽厘，终非持久之策耳。

秋闱在即，北上者纷纷。近京一带自五月来时雨时旸，大田多稼，大有丰年景象。深盼协卿^①来京，当差之暇，仍可下帷研究也。舍亲吴少京兆清鹏^②乔梓书院一席，还望推爱嘘植，俾得蝉联，感同身受。草草敬泐，虔颁勋安，并潭署嘉福。

年愚兄普顿首。七月初五日。

再，舍亲吴孝廉安业，前承推爱，为置海州板浦书院一席。伊乔梓书来，极为铭感，还祈始终栽培为幸。舍侄美身、道身现已无须回避，恩帡之下岁月方长。敢乞随时加之教诲，俾识步趋，举家戴德，载泐惟垂鉴至荷。

谨又启。

按，咸丰五年(1855)六月二十日，黄河在河南兰阳下北厅铜瓦厢决口^③，据“兰阳下北厅告警”等语，可知此信作于咸丰五年(1855)七月初五日。

黄河此次决口，河水分为三股，从直隶、山东境内入海，濮、范以下，寿张、东阿以上尽遭淹没，沿途百姓流离失所，受灾严重。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，清政府全力镇压，应接不暇。运河漕运不畅，部分漕粮改由海运，但又受洋盗骚扰，许乃普所称“洋盗萌动”，确属实在情形。杨以增身肩办理漕运、保障地方之责，于咸丰四年(1854)九月擒获土匪头目张彦、杜四、李大选，十月于黄河海口擒获洋盗王大老虎、王永等五十馀人，十一月擒获洋盗包学玉、吴学孔等三十馀人；咸丰五年(1855)八月又积极防堵捻军张乐行、苏添福部，奋力支撑危局，可谓身心交瘁。咸丰五年(1855)十二月，杨以增“病已笃，乡信鸿哀，闻之心恻。购粟千五百石，交官散放，全活尤众”^④，拳拳爱民之心由此即可概见。许乃普建议让杨以增之子绍和赴京任职，一面当差，一面认真研究举业，准备进士考试，同时亦请求杨以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亲戚加以照拂，足见二人关系之深挚。

长龄函(一通)

至堂大兄大人阁下：

前复一函，计邀清览。现闻黄水漫溢，沿河田庐尚无大碍否？此间重刻《洗冤录补注》分惠，尚少讹误，乘差便带呈四部，同官中有能□□□□者，可分惠之。如不敷，当续寄也。步方□君不能捐复，深为惜之。耑此

①即杨以增次子杨绍和。绍和字勰卿，又作协卿。

②少京兆为清代顺天府尹别称。吴清鹏(1786-?)，字程九，一字西谷，号笏庵，浙江钱塘人。清嘉庆二十二年(1817)探花，授编修，历官顺天府丞。诗格出入西江，著有《笏庵诗抄》。

③《清文宗实录》卷一七〇，《清实录》第42册，第887页。

④《崇祀乡贤录》，台湾“国立”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。

敬请台安。余详前书，不赘。

九月十四日，愚弟长龄^①顿首。

按，此信作于九月十四日，且涉及黄河水势情形。因贺长龄卒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而杨以增于同年十二月初六日方到任南河。故贺长龄不可能于此年询问杨以增河务事宜。案杨以增于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九月服阙授开归陈许道道员，奉委在河南办理祥工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祥工决口堵合后，他又奉委督办善后工程及各厅另案土工。据此或可判断此信当作于道光二十一年（1831）九月十四日，时杨以增正任河南开归陈许道道员。

贺长龄为道光朝经世派官员，为官贵州时，积极查禁鸦片，整顿吏治，训练营伍，储粮备荒，恤孤抚幼，劝课桑棉，颇有治绩。因《洗冤录》（即宋慈《洗冤集录》）对官员审理案件颇有参考价值，为各级地方官案头必备之书。贺长龄素知杨以增有藏书之癖，故将版本较好、错讹较少的《洗冤录补注》赠送给杨以增。

周尔墉函（一通）

前户部郎中周尔墉^②再拜谨上东樵节帅世丈大人阁下：

正月杪，肃贺寸笺，由琪丞^③处转寄，计蒙伟照。顷阅邸抄，知合龙成功，已于廿九日飞章入告，上慰九重，下安万姓，且当此氛沴鸱张之际，绩奏平成，不独大河永庆安澜，而消反侧于无穷者，其功匪小。天颜有喜，臣子靖献之忧，亦可稍慰。尔墉久客思归，此念本切，近日得邸报，悉江南消息，愤懑之怀，几不能自主。立翁^④获谴，安翁^⑤又移堵镇江，金陵情形不堪设想。贼由陆而水，顺流东窜。一到南京后，恐由水而陆。局外私忧以为淮扬之防剿，似更吃重于镇江以南之防。况河漕标兵各有专司，例不操演。想全局罗胸者，必有预拨劲旅（未完）

①即贺长龄。长龄（1785—1848），字耦耕，号西涯，湖南善化人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赞善。道光中任江苏、福建、直隶等省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、云贵总督，重经世致用之学，惠政颇多。参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整理：《贵州通志·宦迹志》五《贺长龄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85页。

②周尔墉（1792—1858），字容斋，浙江嘉善人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应顺天乡试，中副榜，官至户部郎中。晚年主讲开封宜山书院，娱情翰墨，尤长于书。

③即庄瑶。庄瑶字琪园，山东莒州人，嘉庆进士，官工部郎中，著有《声韵易知》、《式古编》、《小琅玕馆杂体诗草》。

④即陆建瀛。建瀛（1792—1853），字立夫，湖北沔阳人，道光二年（1822）进士。历任天津道、直隶布政使、云南巡抚、江苏巡抚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任两江总督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二月江宁城破时被杀。参见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卷三九七《列传》卷一八四《陆建瀛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11795页。

⑤即杨文定。文定（？—1856），安徽定远人，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进士，历任刑部郎中、广东惠潮嘉道、江苏巡抚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因剿办太平军不力被革职逮治，六年（1856）遣戍新疆，旋卒。

按，陆建瀛于咸丰二年（1852）十二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负责苏、皖、赣三省防务。后因形势严峻，受命赴九江防堵太平军。三年（1853）正月，陆建瀛擅自折回江宁省城，因“遇事张皇失措，退缩自全”^①被革职。江苏巡抚杨文定因藉词退守，被革职留任，并受命防守镇江。此正可与“立翁获谴，安翁又移堵镇江”相印证。据此，则此信当写于咸丰三年（1853）二月。

杨以增堵合南河下北厅丰工决口在咸丰三年（1853）正月二十六日。此时太平军已深入长江流域，此次顺利堵口确是在“氛沴鸱张之际，绩奏平成”，周尔墉也因此对杨以增颇多赞赏。此信未完，下文当陈述自己对于江南防务的看法，并对杨以增所属河兵战斗力表示担忧。杨以增在堵筑丰工决口完工后，即积极进行江南防御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四月六日，与四川总督慧成上《统筹全局择要布置折》，对徐州、扬州一代布防进行了通盘安排。同时积极布防清江一带防务，在咸丰三年（1853）四月十八日上《清江西路紧要添兵严防折》，派委千总刘冠文、武举张万春等管带练勇三百名驰赴蒋坝扎营，并赶来安、天长等处分投巡哨。又因滁、凤东北临淮关为进入洪湖要路，随饬山东莱州营参将嵩瑞率领所带官兵驰赴盱眙上游，以资堵截，并飞札沿湖州县将湖船悉数调泊北岸，委员严查，以防偷越。自此直至他于咸丰五年（1855）冬病故，杨以增作为河道总督，在军兴之时竭力筹划布置，设立粮台，安排粮饷，置办火药铅子，调派官兵练勇，时与太平军及捻军周旋，殚精竭虑，不遗余力，颇尽忠臣之责。信中所言，涉及背景如是。

钱仪吉函（一通）

六月十日得至堂先生书，知有第三郎之戚，述怀奉慰，率成三章，录请鉴正。经时旱太甚，一昔雨骤凉。风物顿凄警，蟋蟀已在堂。绸缪结遐思，使节怀秦疆。陆海今何有，苦心抚羸尪。一夫闵失所，忍见童鸟殇。厥生况有征，元鸟千百翔。名之曰燕庆，金谓神降祥。髫龄笔五色，早拟文成张。奈何庵且暴，毛羽忽摧藏。老凤声啾啾，和鸣失归昌。尚烦念俦侣，往事同尽伤。

疾苛人事常，举世无和缓。吁嗟骨肉情，徒自忧心憇。仓卒以药误，追忆知中憇。家儿乃不然，久斥庸医诞。市中石与陈，冰火互凉暖。虚与之委蛇，不受一丸散。妻孥不可谏，追恨肠空断。臧谷等亡羊，谁能左右袒。无已归之天，越哉命修短。墮地已前定，贤愚何足算。

洪钧播万象，一掷无终完。区分益茫昧，并育枭与鸾。桃李忽冬华，秋风败丛兰。纷纭迭否泰，如环循无端。阴阳所变异，何物足□括。获麟不得蓄，屠龙敢摧残。鶻鵠一枝守，亦自遭弋弹。即事审其由，推测良复难。太虚不可思，任运阅暑寒。和神以为春，真想每在欢。中年遭哀乐，愿得寝食安。君子道其常，达人垂大观。□□审所由，所误作其□。

①《清文宗实录》卷八四，《清实录》第41册，第31页。

愚弟钱仪吉^①初属稿。

按，据钱仪吉诗中“绸缪结遐思，使节怀秦疆”之句，可判断此诗当作于杨以增担任陕西巡抚期间。杨以增于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三月十六日被任命为陕西巡抚，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九月二十六日交卸陕西巡抚篆务，赴京陛见，同年十二月初六日正式上任。据此，则此信当作于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或二十八年（1848）六月十日。

龙启瑞《江南河道总督杨公神道碑》称，杨以增长子绍谷，官云南大理府通判；次子绍和，官内阁中书，后升通议大夫。此外尚有女四人。张英麟云：“端勤公（杨以增谥端勤）有三子，公（杨绍和）其仲也。”^②则杨以增尚有一子，但姓名无考。钱仪吉诗首章称“髫龄笔五色，早拟文成张”，可知杨以增第三子自幼聪慧，善属文章，颇得杨以增喜爱。因此在此子夭折后，杨以增“老凤声啾啾，和鸣失归昌”，哀痛异常。再据钱诗此章“仓卒以药误，追忆知中憲”，可知杨以增此子当得急病，仓促之中因服药不当去世。钱仪吉在三章中期盼杨以增“和神以为春”，“愿得寝食安”，尽快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，并以“君子道其常，达人垂大观”，来极力劝慰。

彭邦畴函（一通）

至堂年兄：

去岁駘从来京，藉图良晤，快慰渴口，别来倏已年馀。伏想政祉绥嘉，循声益著，凫叶颂私。

生耳病如昨，出山之举，不敢作是想。日与笔墨为缘，久之亦觉自适其适。贱躯亦顽健，堪以告慰记怀。兹有恩者，生现服之药须用黑铅。此间所有大率皆经熔炼，乞于黔省代谋生铅一二斤，作速寄来为望。专此布商，即候近佳，欲言不尽。

友人彭邦畴^③顿首。十月初五日。

按，彭邦畴辞官家居在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其致杨以增信中称“出山之举，不敢作是想”，又称“久之亦觉自适其适”，则此信当作于道光五年（1825）之后较长时间。彭邦畴因所服之药中有黑铅一味，请杨以增在贵州代谋。杨以增自道光二年（1822）至十四年（1834）为官贵州，据此则可判断此信当作于道光十

①钱仪吉（1783—1850），字衍石，号心壘，又号新梧，浙江嘉兴人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，散馆授户部主事，擢给事中。道光中游广东，主学海堂。晚客汴，主大梁书院讲席十馀年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杨以增分巡开归陈许道，官于河南开封，钱氏此时亦主讲大梁书院，遂结为至交。钱氏曾为以增高祖母唐氏作《杨节母家传》，为以增父兆煜作《杨公墓志铭》。钱氏刻《经苑》，以增曾出资襄助。

②张英麟：《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公墓志铭》，《聊城县志·耆献文征》卷又下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文行出版社。

③彭邦畴（1776—1839）字范九，号春农，江西南昌人，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任编修，历任左赞善、司局洗马、侍读学士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八月任顺天学政，不久辞官，后卒于家。

四年(1834)之前,但具体时间尚无法确定。

据此信可知,杨以增曾遣人赴京看望彭邦疇,彭邦疇对杨以增之从政印象颇佳,评价很高,亦可为杨以增治绩之旁证。

王拯^①函(一通)

敬再启者:

赐寄柏枧先生^②文集、冀子^③丈诗集各五部,均已拜□。嘱送涤翁^④各一部,即送去。龙翰臣^⑤适已到京,亦将《柏枧山房》如指送交,并达尊意拳拳,翰臣当即有书奉报也。柏枧文为方、姚以来一大宗,陈诗亦嘉、道间绝好家数,大力付梓,功德无量。我辈咸当感□肺膺。拙文为涵通楼^⑥谬收,

①此信题署王拯,为整理者所加。李士钊《杨承训为兴建“海源阁纪念馆”捐献重要图书文物》(《山东出版志资料》第一辑,山东人民出版社,1984年)认为此署名“晚”之信札作者为许瀚。拙著《海源阁藏书研究》(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,商务印书馆,2012年)亦误作许瀚,今特予更正。

②即梅曾亮。曾亮(1786—1856),字伯言,一字柏枧,江苏上元人。道光二年(1822)进士,后入资为郎中。晚年辞官,主讲梅花书院。曾亮为文师从姚鼐,古文成就为人瞩目,为桐城派后期大家,此信中所言“柏枧文为方、姚以来一大宗”即是。杨以增与梅曾亮为同年进士,关系密切,梅曾亮曾为杨以增父兆煜作《杨府君墓志铭》,为杨以增业师叶葆作《教思碑》。咸丰五年(1855),杨以增为梅曾亮刊刻《柏枧山房文集》完成后,未及两月即病逝任上。梅曾亮悲痛异常,扶病为杨以增作《杨公家传》,未几亦卒。杨以增二子绍谷、绍和为其续刻《柏枧山房诗集》。参见徐世昌:《梅先生曾亮》,《清儒学案》卷八九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3523页。

③即陈祖望。祖望(1788?—1851?),字冀子,号拜芗,浙江山阴人,游幕为生,足迹遍齐、鲁、淮、汴,著有《史记集评疏证》、《清琅玕吟馆词抄》。参见徐世昌: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二四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5330页。

④即曾国藩。国藩(1811—1872),字伯涵,号涤生,湖南湘乡人,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,封一等毅勇侯,卒谥文正。参见赵尔巽: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五《列传》卷一九二《曾国藩传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1907页。

⑤即龙启瑞。启瑞(1814—1858),字辑五,号翰臣,广西临桂人,道光二十一年(1841)恩科状元,授翰林院编修,累迁江西布政使。龙启瑞与杨以增交谊深厚,在杨以增去世后,为作《江南河道总督杨公神道碑》。参见赵尔巽: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二《列传》卷一九二《龙启瑞传》,第13291页。

⑥广西临桂唐岳聚书数万卷,其藏书处名曰涵通楼,在广西临桂南之雁山。咸丰四年(1854)唐岳曾于此编刊《涵通楼师友文钞》,其卷首《序》云:“然其夙昔所好者弗能忘也,爰取所录存者自梅、吕两先生至定甫凡六人,重加校正,撮其尤者,都为一编,付之剞劂,并附诗词于后,庶所闻于师友者不致散佚云。刊既成,藏于家之涵通楼,因名曰《涵通楼师友文钞》。”《文钞》收梅曾亮《柏枧山房文抄》二卷、吕璜《月沧文抄》一卷、朱琦《来鹤山房文抄》二卷、彭昱尧《致冀堂文抄》一卷、龙启瑞《经德堂文抄》一卷、王拯《龙壁山房文抄》二卷,并附龙启瑞《汉南春柳词抄》一卷、王拯《瘦春词抄》一卷、苏汝谦《雪波词抄》一卷。

承加奖勉勗，慚感之至。学业未成，但深向往，敢不益加策励？天使言老^①依然世上，亟当料理所业，以就正有道。乃□□尘土，迄今未及，当徐图之。刻下亦不复致书，其诗集续刊印成，仍望赐寄。想比来所作文必不少，前所寄示两册，日下知交传睹殆遍，传抄甚多，遂已散布人间矣。时方寥落，幸得先生鸿奖，存斯事于一线，望风倾仰，莫罄佩忱。临楮不尽之怀，敬得长句一章，聊写鄙怀，辄□另纸呈教。涤翁已□□□记名，其文集补刊将竟，独有千古，亦为当时硕果蒙泉矣。专肃载颂台祺，不尽百一。

晚又顿首。四日。

命觅涵通楼全帙，续有乡人带到，必当寄呈，此板在桂林故也。又及。

按，杨以增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刊刻陈祖望《思退堂诗抄》十二卷、《青琅玕吟馆词抄》一卷，咸丰五年（1855）十月刊成梅曾亮《柏枧山房文集》。杨以增卒于同年十二月，则此信当作于咸丰五年（1855）冬，而以同年十月可能性较大。

此信未署名，据抬头“敬再启者”及末尾“晚又顿首”，可知此信之前当有一信。上信写完后，尚有馀意未尽，故又续作此信。或因此两信同时寄出，故此信未署名。信中称“龙翰臣适已到京，亦将《柏枧山房》如指送交，并达尊意拳拳，翰臣当即有书奉报也”。今检龙启瑞《经德堂文集》卷三《上杨至堂年丈书》云：“前月入都，乃于同年少鹤农部所，得见惠大刻《梅伯言先生文集》一部。少鹤并述书中见及语，意思拳拳，感与惭并不可名状”^②，正可与此信内容相印证。龙信中所称少鹤农部为广西马平人王拯，王拯（1815—1876）与龙启瑞均为广西人，同中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恩科进士，龙启瑞并中此科状元。二人既有同乡之好，兼修同年之谊，过从甚密，且均师事梅曾亮，每有所作，辄奉梅曾亮校正，故颇以古文知名，而与吕璜、朱琦、彭昱尧并称“桂岭五大家”。因王拯、龙启瑞均师事梅曾亮，故杨以增在《文集》完成后，专门派人送至京城王拯处，并托王拯转交龙启瑞。龙启瑞对梅曾亮诗文非常关注，其《经德堂文集》卷三《上梅伯言先生书》云：“先生文集曾否刻成？便乞以一帙见寄……先生诗集从前未录出，不知能以副本见寄否？”^③因此杨以增寄送《柏枧山房集》于龙启瑞，可谓正惬意所怀。梅曾亮与杨以增关系十分密切，多年来讯问不断，时相酬答，友谊深厚。梅曾亮晚年受太平天国战乱所扰，颠沛流离，杨以增于咸丰四年（1854）八月将梅曾亮接至江苏清江浦南河总督衙署，两人对案食者逾年，并在南河节署为梅曾亮刊刻诗文集，以贺梅曾亮七十之寿。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、姚鼐而自立风格，对梅曾亮也非常推崇，故杨以增亦专门托王拯转赠曾国藩一部。

崇恩函（一通）

至堂尊兄中丞大人阁下：

①梅曾亮字伯言，故称。

②吕斌：《龙启瑞诗文集校笺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，第427页。

③吕斌：《龙启瑞诗文集校笺》，第425页。

前在沔县，曾布一函，专致谢忱，谅登箴掌。兹于月之廿一日获读手书，备承心注。藉知起居万福，勋业千秋，遥企清辉，莫名欣慰。别时承索近作，途中未暇录呈。今小憩成都，谨抄数首奉寄，蜩螗细响，不足言诗，望开示而琢磨之，幸甚感甚！弟此间略整行李，刻日西行。惟日远日疏，时深驰系，尚祈箴砭时责，起我愚狂，是所切祝。专此即颂台安，诸希心照。

弟崇恩^①顿首。五月廿一日，燕鲁公所。

按，杨以增道光二十七年（1837）三月十六日擢任陕西巡抚。崇恩时任山东巡抚，同年十一月，因办理捕务不力，辜恩溺职，被革去巡抚之职，受命赴京听候谕旨。道光二十八年（1838）一月，崇恩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，自京赴任，须经陕西沔县^②、四川成都，此后再“刻日西行”。由此亦可判断此信写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38）五月廿一日。

崇恩经行陕西，当颇得杨以增之助，故在到达沔县后“专致谢忱”。崇恩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、金石学家和诗人，杨以增因此索读近作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崇恩再次担任山东巡抚，咸丰五年（1855）十二月，因黄河改道，山东聊城一带遭遇水灾，杨以增主动捐谷赈灾，崇恩为此上《南河督臣遣家属捐谷一千五百石请量予鼓励片》，请求对杨以增量予恩施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十二月，杨以增在清江浦南河节署去世后，崇恩又于咸丰七年（1857）九月上《崇祀乡贤以维风化折》，请将杨以增入祀山东乡贤祠，以楷模士林，褒扬乡贤。

胡开益函（一通）

（前缺）在今岁两接华函，去岁曾有信托李太守奉寄，前日亦有一札托耿司马顺寄。前信想已浮沉，今信或可到也。

昨接文翰并惠寄六十金，足徵远地萦怀，古谊可感。生近况如常，现居侍读学士之首，升班渐次可望。惟是长安不易，兼之连岁无差，制时弥甚。今得接济，甚为有裨。至眷口平安，眠食无恙，均足慰远念也。

阁下官声甚好，在京皆知，从此自爱，成就正未可量耳。专此奉复，并候升安。惟□□不具覆。

通家生胡开益^③顿首，十二月廿二日。

①觉罗崇恩（1803—？），字仰之，号香南居士，满洲正红旗人，累任山东巡抚、内阁学士，工书法，精鉴赏，收藏碑帖甚富。

②沔县为川陕栈道经行之要地，杨以增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二月初六日上《修理栈道动用银数折》称：“宁羌州境内栈道自沔县交界金堆铺起，至四川广元县七盘关止，绵长一百七十五里……为川陕往来要路，文报差事络绎不绝。”（杨绍和编《先都御史公奏疏》卷二）则崇恩由陕赴川，必要经由此地。

③胡开益：直隶宛平县人，嘉庆七年（1802）进士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任河南乡试副考官，后任詹事府詹事，道光八年（1828）任安徽学政，后任侍读学士，道光十三年（1843）因在翰詹各员考试中名列三等，而降任编修。

按，胡开益道光二年(1822)已任侍读学士之职，道光八年(1828)三月升任詹事府詹事。据胡开益信中称“现居侍读学士之首，升班渐次可望”之语，此信当写于道光七年(1827)或此前一二年。

杨以增道光二年(1822)考中进士，分发贵州，自道光四年(1824)至七年(1827)一直担任荔波知县一职。其洁己爱民，诚心办事，颇有循吏之声，且于道光四年(1824)十月被护理贵州巡抚、布政使吴荣光专折保奏。据胡开益此函，则杨以增在京城已颇有官声，由此亦可见杨以增治绩之突出。

许瀚函(一通)

晚生许瀚顿首顿首谨稟至堂老先生大人阁下：

前者枢谒，渥承钧海，备荷鸿慈，燭其宿逋，筹及内顾，感何可名！

拜辞后即日登舟，于是月十一日抵杭，沿途均叨庇平顺。各处年岁丰穰，情形安谧，惟月河潮涌，不便行人，乃皆取道孟河。江面太阔，又值阻风，耽延五日，是以到杭较迟。与子苾先生^②接见，久别重会，情谊殷拳。同事十馀人，或旧好，或神交，或新识，皆相契合。主人公暇，辄聚同好诸友，讨论金石文字，意欲有所箸定，尚无章程。兼之揭本重累，在署十无一二。又耽书籍，遇有考订，靡所稽察。此事固非可以白战奏功，聊复萃集众见，留备采择，将来未必能有成书也。瀚到日无多，行止未能即决。知荷屢注，先此略陈大概，稟请钧安，餘容续稟。

瀚謹稟。

按，吴式芬担任浙江学政在咸丰四年(1854)十月，咸丰五年(1855)十二月因病解任。吴式芬致杨以增函称：“正月初间，弟因接丁心斋(丁心存)信，知许印林奉讳肯来杭州。”^①据《许瀚年谱》“1854年条”称许瀚父致和卒于是年十月，“1855年条”称是年八月，许瀚赴吴式芬之邀，赴署校文。同年九月途经苏州^④，九月十一日抵达杭州。结合信中“瀚到日无多”等语，可判断此信当作于咸丰五年(1855)九月中下旬。

许瀚精于小学，杨绍和曾有诗赞曰：“说文八千字，汝南承家学。穷年事丹

①许瀚(1797-1866)，字印林，一字符翰，山东日照人。清道光举人，任滕县训导。四次赴京会试均落第，乃致力于金石方志、文字音韵、校勘目录之研究，其著述及校订之作多至近70种。参见袁行云：《许瀚年谱》，齐鲁书社，1983年。

②即吴式芬。式芬(1796-1856)，字子苾，号诵孙，山东海丰人。道光十五年(1835)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后擢广东右江道，署按察使，任鸿胪寺卿、浙江学政，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后卒于家。吴式芬精金石考古、训诂音韵之学，精于考订，凡鼎彝、碑碣、汉砖、唐镜之文，皆拓本收录。

③骆伟：《〈海源阁珍存尺牍〉萨迎阿、翁同书、陈官俊、吴式芬书札》，《天一阁文丛》2012年第10辑。

④许瀚此次行程，据《跋邾东朋鼎》(咸丰四年作)云“次年九月，游杭过苏”，可知他于咸丰五年(1855)八月起程南下，同年九月途经苏州。

铅，观书眼卓萃。”^①杨以增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署河南按察使时即结识许瀚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杨以增委托许瀚校订刊刻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五十卷及许鸿磐《方舆考证》一百二十卷，并相互购赠善本书。从杨以增致许瀚信（详见骆伟《〈海源阁珍存尺牍〉清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面辑注》）中，即可了解二人就刊刻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往返商议的过程，同时也足见杨以增对许瀚人品才学的充分信任。杨以增翌年四月即升任甘肃按察使，《义证》未能校订完毕，仅刊刻一册。但此后二人通信不绝，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三月，杨以增在陕西巡抚任上，得知江南有刊刻《义证》之讯，遂致信许瀚详询，并问及桂馥近况。但在此之前，两人并未见过面，直至此次赴杭州，路经清江督署，始首次相见。为解除许瀚路途及赴杭的后顾之忧，杨以增还“蠲其宿逋，筹及内顾”，令许瀚非常感激。许瀚到杭之后，迅即写信告知杨以增其会友、校书近况。

以上十四通尺牍之作者均为当时的要员、文人或学者，且均与杨以增过从甚密。其信或谈学论政，或叙及家事，或言及交往，涉及杨以增交游、从政、刻书、藏书等诸多方面，保留了杨以增生活交往的细致片段，较为直观地反映了晚清文人的思想和心态，对研究晚清历史和文化及杨氏生平，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。

【作者简介】周广骞，男，上海大学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丁延峰，男，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骆伟，男，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：版本目录学、地方文献等。

^①杨绍和：《许印林广文翰》，《仪晋观堂诗钞》，民国九年（1920）杨敬夫刻本。